

知識天地

跨文化哲學與漢語的潛力

何乏筆副研究員（中國文哲研究所）

一、「我們的現代性」

在十七世紀，中國透過基督教傳教士開始接觸現代歐洲的科學與技術。在十九世紀，以帝國主義之暴力所擴充的現代性，瓦解中國的政治基礎。然而，到了二十一世紀，「西方」所迫使的「東方」現代性，已經在許多方面對現代化的原先推動者發生了深遠的影響（目前此影響主要出現在經濟的領域中）。因此，在現代性的全球化之後，「我們」對現代性的分析不能再局限於歐美世界，更必須跨出歐美的範圍，朝向跨文化的分析。如此才能使當代的問題反映在哲學反思之中。問題在於：就哲學而言，其他文化圈的歷史資源（如中國的歷史），對反省現代性，如何可能發揮更積極的作用？倘若現代化已使整個人類成為內在性的關係網絡，對「我們現代性」及其界限的歷史分析，便須無分軒輊地運用歐洲的或中國的歷史資源。這意味著「中國」不再是外在（於西方）的現代性，反而是內在（於全球）的現代性。

在此情況下，跨文化哲學出現了某種看似吊詭的機會：原因在於漢語的當代思想在相當程度上已經歷了西方知識的挑戰，同時西方思想逐漸擺脫古希臘／基督教的形上學框架，並向後形上學思想發展。就當代哲學而言，此乃意味著一種嶄新跨文化呼應的萌生。由此觀之，文化間際的「差異建構」可放在共同問題的跨文化建構中來定位（這些問題乃來自現代的共同內在性）。由當下的特定問題出發，哲學的歷史分析同時可進入中國的和歐洲的資源，以凸顯現有狀況之必然性的限制。就跨文化的知識考古學而言，中國和歐洲同樣都是「域外」，而成為域外思想的來源，以及當代界限經驗的可能性條件。藉此，「我們現代性」的另類批判遂成為可能。

二、漢語作為哲學語言的獨特潛力

筆者將「漢語」理解為一種可突破文化比較框架的媒介。由「當代漢語哲學」的觀念出發，「漢字」作為書寫媒介，將為西方哲學與中國哲學的非溝通狀態提供出路。「哲學」在現有漢語學術圈中的制度化，足以暫時構成兩者在當代哲學脈絡下的互動管道。而且，在當代漢語的領域中，一百多年來對西方哲學的接受與轉化已然滲透到日常用語中。換言之，若從「哲學」在當今世界的現實出發（而非從哲學的「本源」），以漢語所進行的「哲學」當然是存在的。如同在西方一樣，哲學乃是傳統知識與現代知識之間的重要連結。「哲學」自從成為現代學科以來，不斷地逼迫傳統的知識和實踐體制面對現代性的問題。

哲學在中國的現實存在面臨兩種主要的對應方式。第一種是指控西方知識的暴力侵入，而試圖重新回歸到西方影響之前的「中國哲學」，甚至放棄「哲學」的概念。另一種方式在將此現實存在看成開啓多樣發展方向的實驗場域。歐洲哲學界對於非歐洲文化往往連最基本的認識都有所欠缺，正因如此，截至目前關於後者的對應方式，這類的選項仍有所缺如。從另一角度觀之，西方知識以強勢方式進入東亞的情況，在今天已蛻變為漢語哲學的優勢，成為跨文化哲學的豐富資源：西方哲學文本的翻譯、解釋和轉化，以及對於中國文本的哲學研究，便共存於相同的哲學平臺。只要將兩者理解為當代漢語哲學的不同面向，便得以開展一種另類的發展空間。

以漢語所進行的哲學研究已開始對現代西方哲學產生創造性的轉化。就長期的發展來說，西方世界（尤其是歐洲）對於哲學的認知不再能忽視「哲學」在漢語領域中的發展。法國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曾經指出，「西方思想的危機等於是帝國主義的終止」。他揣想，在「西方哲學的終止」後所出現的「未來哲學」，將會在歐洲之外，或是透過歐洲與非歐洲的相遇和碰撞而產生。那麼當代漢語哲學在中國哲學與西方哲學之間所構成的呼應關係，很可能在此一轉變中扮演重要角色。

三、走出民族主義

跨文化哲學顯然只有在特定的語言中才有可能，而在特定的語言中，特定的跨文化問題會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獲得充分的呈現。在此，所謂「跨文化」不應該局限於跨出範圍極廣的「文化圈」（如歐洲、美國、東亞等），而應包含跨越語言界限的「跨語言哲學」，其中的關鍵在於兩種或多種語言之間的翻譯關係。在筆者看來，歐洲語言的

內部關係，以及歐洲語言與東亞語言之間的關係，不應被視為不同類型的關係；差別僅在於該一關係在歷史中的長短及積累程度。就長期的歷史發展而言，兩者顯然是相對的，而且不斷地在改變（就此可參考德語哲學與法語哲學的關係在過去一百年間所經歷的演變）。對古典德國哲學的形成而言，希臘文、拉丁文、英文與法文的組構模式作為決定性的要素。從十八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德語曾經是一種「跨語言的語言」（或跨文化的語言），而以德語的特殊性能夠呈現跨文化問題（亦即具有某種普遍意義的問題）。到了二十世紀的後半段，德語大體上失去了跨語言的實驗精神，法語反而成爲一種跨語言的哲學場域，透過與德語哲學或隱或顯的吸收和創造性轉化，而展開當代法國思想。筆者揣想，現代漢語與東西方的重要語言（如日語、英語、德語、法語、俄語）早已產生複雜的翻譯關係，也因此累積了跨文化哲學的潛力。

就筆者的粗略觀察來看，漢語哲學的跨文化潛力特別豐富，因爲現代漢語一方面在西方知識的強力衝擊下經歷過激進的轉變，但同時，現代白話文又與古典漢語（文言文）的歷史資源保持了聯繫。現代漢語不僅與中國歷史資源的關係未全然切斷，同時也與在前民族主義時代屬漢字文化圈之區域（日本、朝鮮、越南）的漢字文獻維持聯繫。這些國家一旦將在其文化之內部所存在的漢字視爲要排除的異物，或至少將之視爲「己者」中的「他者」，則會造成與「自己」部分歷史的斷裂。文化本質主義及民族主義的現代化意識形態經常分辨己者與他者，因此難以承認文化多樣性和混血性的現實，從而導致不同程度的文化分裂症。作爲一種哲學語言，漢語經過現代化的衝擊和挑戰而自立自強。不過，抽象地呼喚漢語哲學的跨文化潛力是毫無意義的。此潛力必須在哲學工作之中被證實，並且必須面臨當代哲學最嚴峻的考驗。其中的重要挑戰是，將哲學一再重新對自身所進行的界定活動，理解爲一種動態發展的關鍵要素。在此意義下，在漢語範圍內建立當代歐洲哲學與當代漢語哲學的互動（目前漢語已具備了條件，來進入一種歐洲語言到目前爲止所拒絕的互動），便意味著，漢語哲學可進行「我們」共同現代性相關的跨文化分析。若將西方哲學在現代漢語中的翻譯視爲當代漢語哲學的當然成分，「漢語哲學」與「中國哲學」的差異便顯現：當代漢語哲學與建立中國的民族哲學有所區別，因而具有批判性的含意。

※各期知識天地文章請逕於本院網頁：<http://www.sinica.edu.tw/>「常用連結」之「週報〈知識天地〉」項下瀏覽。※